



华夏文明之源

河西故事



MOGAOKU DE SHOUWANGZHE

莫高窟的守望者

赵声良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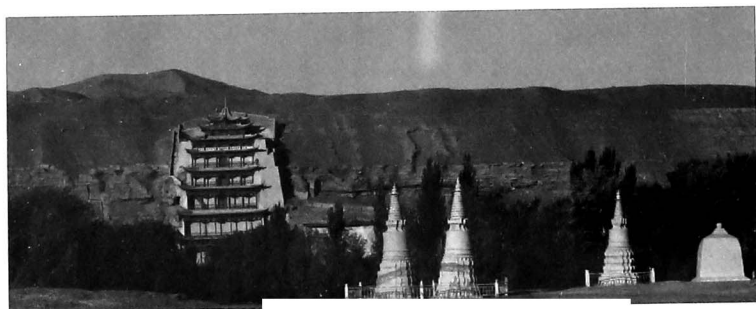


甘肃人民出版社

MOGAOKU DE SHOUWANGZHE

华夏文明之源

河 西 故 事



MOGAOKU DE SHOUWANGZHE

莫高窟的守望者

赵声良 /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莫高窟的守望者 / 赵声良著. -- 兰州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4. 1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226-04544-2

I. ①莫… II. ①赵… III. ①敦煌学—研究 IV.
①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5406号

出 版 人：吉西平

责任编辑：张 菁

美术编辑：马吉庆

莫高窟的守望者

赵声良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甘肃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2.75 插页2 字数168千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7-226-04544-2

定价：30.00元



华夏文明之源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连 辑

副 主 任：张建昌 吉西平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永强 王正茂 王光辉

刘铁巍 张先堂 张克非

张 兵 李树军 杨秀清

赵 鹏 彭长城 雷恩海

策 划：马永强 王正茂

总 序

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甘肃作为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不仅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而且参与谱写了华夏文明辉煌灿烂的篇章，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甘肃长廊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历史上一直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汇的锋面和前沿地带，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历史舞台，不仅如此，这里还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交汇、融合之地。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因此，甘肃不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华夏的“民族走廊”（费孝通）和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而且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通道。

自古就有“羲里”、“娲乡”之称的甘肃，是相

传中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的诞生地。距今 8000 年的大地湾文化，拥有 6 项中国考古之最：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业标本、中国最早的彩陶、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中国最早的宫殿式建筑、中国最早的“混凝土”地面、中国最早的绘画，被称为“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奇迹”。兴盛于距今 4000—5000 年之间的马家窑彩陶文化，以其出土数量最多、造型最为独特、色彩绚丽、纹饰精美，代表了中国彩陶艺术的最高成就，达到了世界彩陶艺术的巅峰。马家窑文化林家遗址出土的青铜刀，被誉为“中华第一刀”，将我国使用青铜器的时间提早到距今 5000 年。从马家窑文化到齐家文化，甘肃成为中国最早从事冶金生产的重要地区之一。不仅如此，大地湾文化遗址和马家窑文化遗址的考古还证明了甘肃是中国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是中亚、西亚农业文明的交流和扩散区。“西北多民族共同融合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甘肃的史前时期”，甘肃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四坝文化、沙井文化等，是“氐族、西戎等西部族群的文化遗存，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此交融互动，形成了多族群文化汇聚融合的格局，为华夏文明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田澍、雍际春）。周、秦王朝的先祖在甘肃创业兴邦，最终得以问鼎中原。周先祖以农耕发迹于庆阳，创制了以农耕文化和礼乐文化为特征的周文化；秦人崛起于陇南山地，将中原农耕文化与西戎、北狄等族群文化交融，形成了农牧并举、华戎交汇为特征的早期秦文化。对此，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前者“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礼仪与道德传统”，后者“铸就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两者都为华夏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自汉代张骞通西域以来，横贯甘肃的“丝绸之路”成为中原联系西域和欧、亚、非的重要通道，在很长一个时期承担着华夏文明与域外文明交汇、融合的历史使命。东晋十六国时期，地处甘肃中西部的河西走

廊地区曾先后有五个独立的地方政权交相更替，凉州（今武威）成为汉文化的三个中心之一，“这一时期形成的五凉文化不仅对甘肃文化产生过深刻影响，而且对南北朝文化的兴盛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张兵），并成为隋唐制度文化的源头之一。甘肃的历史地位还充分体现在它对华夏文明存续的历史贡献上，历史学家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慨叹道：“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时期，中原魏晋以降的文化转移保存于江东和河西（此处的河西指河西走廊，重点在河西，覆盖甘肃全省——引者注），后来的河西文化为北魏、北齐所接纳、吸收，遂成为隋唐文化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华夏文明曾出现断裂的危机之时，河西文化上承秦汉下启隋唐，使华夏文明得以延续，实为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链条。隋唐时期，武威、张掖、敦煌成为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国际化都市，中西方文明交汇达到顶峰。自宋代以降，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全国经济重心遂向东、向南转移，西北丝绸之路逐渐走过了它的繁盛期。

“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这是甘肃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生动写照，也是对甘肃历史文化地位和特色的最好诠释。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里的历史文化累积深厚，和政古动物化石群和永靖恐龙足印群堪称世界瑰宝，还有距今 8000 年的大地湾文化、世界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被誉为“东方雕塑馆”的天水麦积山石窟、

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的拉卜楞寺、“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道教名山”崆峒山以及西藏归属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历史见证的武威白塔寺、中国旅游标志——武威出土的铜奔马、中国邮政标志——嘉峪关出土的“驿使”等等。这里的民族民俗文化绚烂多彩，红色文化星罗棋布，是国家12个重点红色旅游省区之一。现代文化闪耀夺目，《读者》杂志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舞剧《丝路花雨》《大梦敦煌》成为中华民族舞剧的“双子星座”。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在甘肃境内蜿蜒900多公里，孕育了以农耕和民俗文化为核心的黄河文化。甘肃的历史遗产、经典文化、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观光文化等四类文化资源丰度排名全国第五位，堪称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总之，在甘肃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形成的始祖文化、黄河文化、丝绸之路文化、敦煌文化、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等，以其文化上的混融性、多元性、包容性、渗透性，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融汇着古今中外多种文化元素的丰富内涵，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甘肃历史的辉煌和文化积淀之深厚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也要看到，甘肃仍然是一个地处内陆的西部欠发达省份。如何肩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国家战略、担当好向西开放前沿的国家使命？如何充分利用国家批复的甘肃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这一文化发展战略平台，推动甘肃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和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成为甘肃面临的新的挑战 and 机遇。目前，甘肃已经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与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统筹布局，作为探索经济欠发达但文化资源富集地区的发展新路。如何通过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使华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得以激活，成为融入现代化进程的“活的文化”，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指出，华夏文明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实际上是我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

建设能够缓冲迅猛的社会转型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使传统文化在保护区内完成传承、发展和对现代化的适应，最终让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活的文化”。因此，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原则应该是文化与生活、传统与现代的深度融合，是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统一。要激发各族群众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创造热情，抓住激活文化精神内涵这个关键，真正把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发展体现在整个华夏文明的挖掘、整理、传承、展示和发展的全过程，实现文化、生态、经济、社会、政治等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华夏文化是由我国各族人民创造的“一体多元”的文化，形式是多样的，文化发展的谱系是多样的，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因此，要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华夏文化与现代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华夏文化现代化的自身逻辑，让各族文化在符合自身逻辑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的问题，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中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实现文化传承保护的生态化，避免文化发展的“异化”和过度开发。坚决反对文化保护上的两种极端倾向：为了保护而保护的“文化保护主义”和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忽视文化价值实现的“文化经济主义”。在文化的传承创新中要清醒地认识到，华夏传统文化具有不同层次、形式多样的价值，建立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不是在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洪流中开辟一个“文化孤岛”，而是通过传承创新的方式争取文化发展的有利条件，使华夏文化能够在自身特性的基础上，按照自身的文化发展逻辑实现现代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总摄、整合和发展华夏文化的内涵及其价值观念，使华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得到激活，尤其是文化精神内涵得到激活。这是对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的理性、科学的文化认知与文化发展观，这是历史意识、未来眼光和对现实方位准确把握的充分彰显。我们相信，立足传承文明、创新发展的新起点，

随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推进，甘肃一定会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段”，再次肩负起中国向西开放前沿的国家使命，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创新与传播谱写新的壮美篇章。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策划出版了这套《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丛书”以全新的文化视角和全球化的文化视野，深入把握甘肃与华夏文明史密切相关的历史脉络，充分挖掘甘肃历史进程中与华夏文明史有密切关联的亮点、节点，以此探寻文化发展的脉络、民族交融的驳杂色彩、宗教文化流布的轨迹、历史演进的关联，多视角呈现甘肃作为华夏文明之源的文化独特性和杂糅性，生动展示绚丽甘肃作为华夏文明之源的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和异彩纷呈的文化图景，形象地书写甘肃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和突出贡献，将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神奇的甘肃呈现给世人。

按照甘肃历史文化的特质和演进规律以及与华夏文明史之间的关联，“丛书”规划了“陇文化的历史面孔、民族与宗教、河西故事、敦煌文化、丝绸之路、石窟艺术、考古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河陇人物、陇右风情、自然物语、红色文化、现代文明”等13个板块，以展示和传播甘肃丰富多彩、积淀深厚的优秀文化。“丛书”将以陇右创世神话与古史传说开篇，让读者追寻先周文化和秦早期文明的遗迹，纵览史不绝书的五凉文化，云游神秘的河陇西夏文化，在历史的记忆中描绘华夏文明之源的全景。随“凿空”西域第一人张骞，开启“丝绸之路”文明，踏入梦想的边疆，流连于丝路上的佛光塔影、古道西风，感受奔驰的马蹄声，与行进在丝绸古道上的商旅、使团、贬谪的官员、移民擦肩而过。走进“敦煌文化”的历史画卷，随着飞天花雨下的佛陀微笑在沙漠绿洲起舞，在佛光照耀下的三危山，一起进行千佛洞的千年营建，一同解开藏经洞封闭的千年之谜。打捞“河西故事”的碎片，明月边关

的诗歌情怀让人沉醉，遥望远去的塞上烽烟，点染公主和亲中那历史深处的一抹胭脂红，更觉岁月沧桑。在“考古发现”系列里，竹简的惊世表情、黑水国遗址、长城烽燧和地下画廊，历史的密码让心灵震撼；寻迹石上，在碑刻摩崖、彩陶艺术、青铜艺术面前流连忘返。走进莫高窟、马蹄寺石窟、天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北石窟寺、南石窟寺，沿着中国的“石窟艺术”长廊，发现和感知石窟艺术的独特魅力。从天境——祁连山走入“自然物语”系列，感受大地的呼吸——沙的世界、丹霞地貌、七一冰川，阅读湿地生态笔记，倾听水的故事。要品味“陇右风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神奇，必须一路乘坐羊皮筏子，观看黄河水车与河道桥梁，品尝牛肉面的兰州味道，然后再去神秘的西部古城探幽，欣赏古朴的陇右民居和绮丽的服饰艺术；另一路则要去仔细聆听来自民间的秘密，探寻多彩风情的民俗、流光溢彩的民间美术、妙手巧工的传统技艺、箫管曲长的传统音乐、霓裳羽衣的传统舞蹈。最后的乐章属于现代，在“红色文化”里，回望南梁政权、哈达铺与榜罗镇、三军会师、西路军血战河西的历史，再一次感受解放区妇女封芝琴（刘巧儿原型）争取婚姻自由的传奇；“现代文明”系列记录了共和国长子——中国石化工业的成长记忆、中国人的航天梦、中国重离子之光、镍都传奇以及从书院学堂到现代教育，还有中国舞剧的“双子星座”。总之，“丛书”沿着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探究华夏文明演变的轨迹，力图实现细节透视和历史全貌展示的完美结合。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积累多年的文化和出版资源为基础，集省内外文化精英之力量，立足学术背景，采用叙述体的写作风格和讲故事的书写方式，力求使“丛书”做到历史真实、叙述生动、图文并茂，融学术性、故事性、趣味性、可读性为一体，真正成为一套书写“华夏文明之源”暨甘肃历史文化的精品人文读本。同时，为保证图书

内容的准确性和严谨性，编委会邀请了甘肃省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兰州大学以及敦煌研究院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和学者参与审稿，以确保图书的学术质量。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2014年8月

前言

敦煌是一个古老的城市。

敦煌以宏伟而精美的石窟艺术著称。

敦煌以蜚声海内外的显学——“敦煌学”而著称。

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代又一代学者、艺术家到敦煌朝圣。为保护和研究敦煌石窟，很多学者奉献了毕生的精力，有的虽然没有长期守护在敦煌，却也不断地关注敦煌、宣传敦煌、支持敦煌事业。由于各界人士持续不断地关心和支持，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与弘扬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20世纪40年代前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北京等地的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纷纷移向西南，形成了中国文化中心西移的局面，不少学者和艺术家开始关注西部的文化遗产，促成了中国文化界对西部文化的探索与研究。敦煌艺术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人们重新认识，并越来越强烈地对学术文化产生影响。

1938年，画家李丁陇来到敦煌石窟临摹壁画。1941年，张大千带领弟子们也来到敦煌，并在敦煌

停留了两年多时间，有计划地临摹了敦煌石窟不同风格的壁画，在四川等地举办展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时期，王子云、关山月、赵望云等画家也先后到敦煌临摹壁画，敦煌壁画一时成为了美术界的热门话题，敦煌也成了20世纪中国画家心中的圣地。

在画家们探索敦煌艺术的同时，还有不少学者如向达、阎文儒等从历史、考古学等方面对敦煌石窟展开了艰苦卓绝的调查研究工作，旨在发掘那些被历史遗忘的传统文化。在多方面调查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决定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敦煌石窟进行长期的保护和科学研究。1944年1月1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被任命为第一任所长。从此，敦煌石窟结束了无人管理的状态。

敦煌艺术研究所创办之初，常书鸿先生率领职工们白手起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莫高窟进行了有效的保护和管理，并积极地调查洞窟内容，临摹壁画，在短期内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莫高窟毕竟处在沙漠之中，生活和工作条件极端艰苦。一年以后，大部分工作人员陆续回到内地，但他依然坚持要把保护和研究敦煌的事业继续下去。工作人员没有了，他再次到四川招聘人才。1946年—1947年，受到常书鸿先生的感召，段文杰、孙儒圃、欧阳琳、史苇湘等陆续来到敦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辈子献身于敦煌事业。新中国成立后，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先生继续担任所长。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不断有历史、考古、美术等专业的人员奔赴敦煌，继续着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事业。60年代初，由于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莫高窟进行了大规模的保护加固工程，同时开展了窟前遗址的考古清理工作。敦煌石窟考古研究也随之起步，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可是，接下来的“十年动乱”，使研究工作陷于停顿。段文杰、史苇湘、孙儒圃、李其琼等专家学者先后遭受迫害，无法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度

玉门关，研究人员重新获得自由，敦煌的专家们又都无怨无悔地回到了莫高窟。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先生任院长，研究条件不断改善，研究人员也陆续增加。还创办了敦煌学研究的专业期刊《敦煌研究》，并主办了多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不断与国内外学术机构进行交流与合作，敦煌研究院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代。1987年，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敦煌研究院开始以世界遗产的标准来进行保护和研究工作，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敦煌研究院采用最新科技手段进行保护和管理，使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研究走在世界的前列。

自1944年以来，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研究事业经过几代人薪火相传蓬勃发展起来，使敦煌艺术这颗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的明珠放射出璀璨的光芒。然而，在这华丽光芒的后面，是众多学者长期地默默奉献，从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到今天仍然坚守在莫高窟的老中青几代工作人员，他们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敦煌事业。

全面讲述他们的故事恐是这本小书难以胜任的，仅在本书第一部分“前辈的足迹”中记录了坚守在敦煌的前辈专家们的点滴生活，以窥见蕴涵在莫高窟人身上的执著与奉献精神。

常书鸿先生是敦煌研究院的开创者，他曾在法国生活了9年，在油画创作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在法国有着优裕的生活。但是，他毅然回到祖国，并在戈壁沙漠中创办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其间，由于生活环境的荒凉，工作条件的艰苦，妻子也离他而去。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敦煌，并以顽强的毅力，坚守敦煌。如果没有常书鸿先生的努力，没有他的坚持，也可能没有现在的敦煌研究院。

段文杰先生对敦煌壁画有着独特的领悟，为人又豁达、开朗。他到敦煌之后，就成为了研究所的一个核心。通过长期的实践，以段文杰先

生为首的画家们在敦煌壁画临摹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并总结出一些重要经验。同时，凭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深入研究艺术史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们今天对敦煌艺术的总体把握与认识，大多源于段文杰等先生的研究成果。在他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期间，号召大家振奋精神，积极开展研究工作，把敦煌学研究搞上去。使敦煌研究院的学术研究得到快速发展，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作为第三代领导人，樊锦诗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敦煌的，她和同仁们把考古学应用到敦煌石窟的研究中。20世纪90年代当她继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她清楚地看到了敦煌石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从世界的眼光来看敦煌，把敦煌研究院建成一个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就成了她的奋斗目标。经过长期的努力，敦煌研究院在文化遗产管理与保护科技等方面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在敦煌学研究以及人才培养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敦煌研究院几代领导人所处的时代不同，遇到的困难与挑战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有着对敦煌石窟无比热爱，对敦煌事业百折不回的执著精神。正是这一种精神，不断地凝聚着一批批学术人才，共同促成了敦煌事业的发展。

除了以上三位在敦煌事业上具有突出贡献的人物之外，本书还介绍了一些长期默默无闻，却热恋着敦煌，并为之奉献终生的人。史苇湘和欧阳琳夫妇都是在20世纪40年代就到敦煌工作的。他们孜孜不倦地临摹了大量壁画，通过壁画临摹，加深了对古代艺术的认识。史苇湘先生注重从历史文化背景来分析敦煌艺术，把握不同时期艺术风格的变化。他们的研究成果和临摹绘画，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孙儒儁和李其琼同样是一对献身于敦煌的伉俪。孙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到了莫高窟，由于他是学建筑的，有关敦煌石窟的保护工程大多

是由他来设计的，数十年来为敦煌石窟的保护作出了重大贡献。李其琼于1952年来到敦煌，她的主要精力投入到敦煌壁画的临摹。她本是学油画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探索后，就对敦煌壁画有了自己的领悟，并不断钻研古代壁画的技法，在临摹方面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贺世哲和施萍婷夫妇是从事石窟内容考释和历史文献研究的专家。他们到敦煌的时间晚于上述几位先生，但同样是一辈子在敦煌勤勤恳恳地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在日积月累的学术研究中，他们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果，而且以他们看似平凡的人生展示了一个学者的学问与人品。

本书第二部分“感悟敦煌”主要记录的是作者自己所经历、所感动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作者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带着几多向往，奔向了敦煌。那个年代，正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学者们决心把“十年动乱”耽误的时间追回来。在敦煌学界，学者们更是振奋精神，决心努力把敦煌学搞上去，不能落后于国外。笔者作为一名研究人员，经历了这三十年来学术巨变：中国敦煌学由弱到强，许多学科领域从无到有，研究人员不断壮大，一些领域逐步领先于世界。笔者直接参与了《敦煌研究》期刊的编辑工作，以及一些敦煌学著作的编辑出版。在自己的研究与思考过程中，越来越认识到敦煌艺术的宏大与深厚，同时也逐渐了解和理解了众多学者是如何受到敦煌的召唤并为之奋斗的。

敦煌石窟是人类的文化遗产，敦煌学也是国际性的研究。因此，关注敦煌的不仅仅是身在敦煌的人们。国内国外学术界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这个问题，并有相当多的学者在为敦煌的保护与研究，为敦煌学的发展付出自己的努力。本书第三部分“敦煌之缘”记录的就是与敦煌结缘的人们。他们有的是国内外著名学者、艺术家，有的只是普通人。但他们都被敦煌所吸引，以自己的方式帮助和支持敦煌的发展。曾长期担任中